



西北民族论丛

Northwest Ethnology Series

周伟洲◎主编 (第十二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西北民族论丛

Northwest Ethnology Series

周伟洲◎主编 （第十二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北民族论丛. 第12辑/周伟洲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097-8173-9

I. ①西… II. ①周… III. ①民族历史-西北地区-文集
IV. ①K28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8930号

西北民族论丛(第十二辑)

主 编 / 周伟洲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高振华

责任编辑 / 陈 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75 字 数: 388千字

版 次 /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173-9

定 价 / 7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西北民族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周伟洲

副主编 王 欣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宏 于志勇 马 强 王 欣

王启龙 方 铁 尹伟先 厉 声

石 硕 刘国防 余太山 杨圣敏

张 云 李大龙 李范文 李 琪

罗 丰 苗普生 周伟洲 哈宝玉

高永久 黄达远 韩中义 樊明方

主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目录

特稿

如何认识康区？

——康区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的地位与人文特点 …… 石 硕 / 1

历史时期陕北地区的民族与民族融合 …… 周伟洲 / 14

北魏对西域的经营与治理 …… 王 欣 / 53

《王锡上吐蕃赞普书》(P. 3201) 的写作时间及

相关史事考 …… 赖 俊 李宗俊 / 68

唐代入华中亚胡人宗教信仰的变化 …… 韩 香 / 85

从防御到割据：黄巢之变与唐末西北藩镇的转型 …… 胡耀飞 / 96

论熙河开边与西北蕃汉民族关系 …… 王志斌 哈宝玉 / 117

青海藏族聚居区形成的历史考察 …… 王 英 / 131

统万城明代城址考论

——兼论忻都城、察罕脑儿城 …… 尹波涛 / 145

国民政府有关十世班禅灵童征认的政策实践研究 …… 徐百永 / 176

中亚东干人语言文字变迁与当代发展思考 …… 王 超 / 192

民间文献《中阿双解字典》研究 …… 韩中义 / 203

中国历史上雪盲的发生、防护与认识 …… 杨东宇 / 290

中国古代的外国与外臣考 …… 王义康 / 297

国际军事合作与中国西北边疆治理

——以上海合作组织防务安全合作为例 王志平 / 343

附录一 第十五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尹波涛 / 353

附录二 第十六届“马长寿民族学讲座”纪要 徐百永 / 358

Abstracts and Key Words 362

如何认识康区？

——康区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的地位与人文特点*

石 硕

摘要：康区是藏族三大方言区和三个传统的人文地理区域之一，因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文化与社会差异性、多样性突出，民族支系繁多等特点，人们对康区人文特点的认识一直存在困境和障碍，也造成康区研究较卫藏和安多一直相对薄弱和滞后。本文在综合并兼顾地缘、经济方式、民族交往与互动、历史演变、文化特点等诸多因素基础上，对康区人文特点进行了初步的归纳和讨论，提出康区具有五个突出的人文特点：1. 康区是农牧混合与农牧过渡地带；2. 康区地处民族走廊地带，是藏族与西南众多民族互动与交融的地区；3. 康区是藏、汉民族交流互动及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连接通道；4. 康区是一条历史文化沉积带，积淀着许多历史遗留物；5. 康区地域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复合性与兼容性。

关键词：康区 民族走廊 人文特点

康区作为藏族三大传统人文地理单元之一，是我们认识藏族地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尽管藏文史籍曾以“人区”一词来概括康区的特点，但对康区整体的社会面貌与人文特点，我们仍然知之不多，至今仍难以得出一个清晰的认识。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康区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社会情况，均呈现极大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分散性，给人们整体上认识康区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康区历来以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文化与社会差异性和多样性突出、民族支系繁多为显著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项目编号：10&ZD110）阶段性成果。

特点。我们知道，一定的文化总是与一定的地理生态环境相联系的，同时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是导致社会及文化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所以，康区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造成了人们对康区社会及人文特点的认识一直存在很大困境和障碍。

第二，目前在藏学领域中，康区研究总体上处于相对滞后和薄弱的状态，人们对康区的了解与认识尚不如卫藏、安多那样充分。康区研究的相对薄弱和滞后，一方面与康区研究的难度，即其社会与人文面貌的复杂性、分散性和多样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康区的地理区位特别是其地跨多个行政区有关。康区的地域横跨今西藏、四川、云南、青海四省区，并处于四省区的结合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又普遍存在按照行政区域来研究民族及历史的倾向。例如，四川省的民族研究机构主要研究四川境内的民族，青海省的民族研究机构则主要研究青海境内的民族。这种按行政区域各自为阵的民族研究格局，使地跨四省区并处于四省区结合部的康区的整体研究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有一事实颇能说明问题，康区地域所跨的四省区现已分别出版《四川通史》^①《云南通史》^②《西藏通史》^③《青海通史》^④，在这些通史类著作中，康区因处在边缘，又为局部区域，自然被相对缺少观照，或是着墨甚少。《西藏通史》的撰写自然主要以卫藏为中心，青海的学者对安多藏族史有诸多研究，但至今唯独没有一部“康区史”。康区研究的薄弱和被忽视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今天的行政区划是近晚才形成的，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岁月中，民族的活动及相互交往并不是按照今天行政区来进行的，也不受今天行政区的任何影响与限制。用一种后起的、人为的区域概念来分割和框定历史上的民族活动，其不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民族研究的经验教训时，针对按照行政区开展民族研究的弊端和局限性，提出了一个带有方向性的重要观点——按照“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

① 陈世松、贾大泉主编《四川通史》（7卷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

② 何耀华总主编《云南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③ 陈庆英、高淑芬：《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④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来开展民族研究。^①什么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所谓“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们大致可将其理解为在历史上由于处于一个相同的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有着大体相似的民族面貌、文化传统与社会类型，并且各民族之间存在密切渊源的民族区域。毫无疑问，按照这一概念，作为青藏高原藏族三大传统人文地理单元之一的康区，正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②

从很大意义上说，对康区社会及人文特点的深入了解是我们认识康区这一藏族人文地理区域的关键与基础。因此，当我们欲对康区的历史脉络进行整体观照之时，首先有必要对康区的社会及人文特点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和讨论。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康区社会及人文的基本特点？众所周知，事物的特点总是相比较而凸显的。如果我们跳出单纯以康区论康区的狭窄视野，将康区置于更大的地域与文化背景之中，置于青藏高原藏族分布地域及青藏高原东缘周边地带更为开阔的地域与文化背景之中，同时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审视，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区显著的社会及人文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康区是农牧混合与农牧过渡地带

如果说卫藏依托得天独厚的“一江两河”河谷地带而形成了以高原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生活方式，安多是以“牧”为特点的，那么康区则是介于两者的一个中间形态——以农牧混合为特色。

康区的地理环境总体上为高山峡谷。其地形特点是高差大，植被及气候的垂直分布显著。所以，康区既有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也有海拔较高的雪山草甸。河谷地带由于海拔较低，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往

① 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② 虽然费孝通先生曾将青藏高原划为一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但在青藏高原范围内，康区无疑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费孝通先生提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明显受到苏维埃民族学派“历史民族区”理论的影响。苏维埃民族学派“历史民族区”的概念，通常是指：“一个由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长期交往和相互影响而在居民中形成类似文化生活（民族的）特点的人们居住区。”康区显然符合此概念。参见〔苏联〕尼·切博克萨罗夫、伊·切博克萨罗娃《民族·种族·文化》，赵俊智、金天明译，东方出版社，1989，第250页；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往形成以农业和定居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而靠近雪线的山岭地带由于海拔较高，气候高寒，不适宜农业耕作，从而成为天然的高原牧场。所以，农牧兼有、农牧混合是康区的一个突出特点。康区的农牧兼有、农牧混合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康区的整体区域看，其既有农区，也有牧区，为农牧兼有。其二，即便是在河谷地带以农耕和定居为主的人，也普遍从事一定的牧业，他们在高山上往往有属于自己的草场和牛羊，草场还有“冬草场”“夏草场”之分。《史记》在描述川西高原地区人们的生活状况时，称“或土著，或移徙”，^①这与康区的面貌是相吻合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康区同时也是一个农牧过渡地带。康区在地理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连接与过渡地带。在东西方向上，它是青藏高原与川西平原的一个过渡地带；在南北方向上，它则是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与连接地带。这种特点，决定了康区在农、牧这两种生产方式上同样处于一种过渡地带。康区北部以牧业为主，它的南部随着海拔高度的逐渐下降，在川西南和滇北一带则以山地农耕为主，所以，从南北方向来看，康区恰好处在从北部的牧业向南部山地农耕过渡的一个地带，这种格局决定了康区“牧”的成分自北向南递减，而“农”的成分则自北向南递增。也就是说，在康区，越往北“牧”的成分越大，越往南“农”的成分越大。在东西方向上也呈现同样的情形，由于康区总体地形是西高东低，处在青藏高原向川西平原的过渡地带，所以从东西方向看，同样是“牧”的成分自西向东递减，“农”的成分则自西向东递增。所以，康区虽然整体上为农牧兼有和农牧混合地区，但同时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农牧过渡地带，无论是自北向南，还是由西向东，其都“牧”的成分递减而“农”的成分递增。

在康区，既有气候相对温暖湿润、人口较稠密的典型的河谷农区，也有海拔较高、地旷人稀、气候寒冷的高原牧区，同时还大量存在农牧兼有、农牧混合的地区，即人们常说的“半农半牧”地区。农、牧的交织和二者的相互依存，是康区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康区的社会既有农耕社会之特点，也有浓厚的牧区特色，农、牧的兼有与混合正是康区同卫藏地区和安多地区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康区地域内农、牧两种成分自北向南和由西向东呈现的交替与变化，是我们认

^①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991页。

识康区社会及人文特点的一个重要视角。

二 康区地处民族走廊地带，是藏族与西南 众多民族互动与交融的地区

康区是以横断山区为自然基础而形成的一个藏区人文地理单元。横断山区因山脉、河流均呈南-北走向，自西向东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穿过，自古以来成为众多民族或族群南来北往、频繁迁徙的场所，也是历史上西北与西南民族之间沟通的重要孔道，是我国一条重要的民族迁徙走廊。费先生称之为“藏彝走廊”，^①也有学者称之为“横断山民族走廊”。^②康区正处于民族走廊地带，自古以来有众多的民族在这里迁徙、流动、冲突、融合，民族间的交融与互动剧烈和频繁，这构成了康区社会及人文面貌的另一重要特点。

历史上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古藏缅语民族系统（习惯上被称为“氏羌民族系统”）主要经康区南下，逐渐散布于整个横断山脉地区。同时历史上的百越、壮傣和苗瑶等南方民族系统的人群也有经此民族走廊北上的。康区自古以来无论在南北方向上，还是在东西方向上，都是多民族的流动与交融之所，众多民族及族群在这里频繁地发生接触、冲突、融合与互动。民族走廊这一特殊背景，构成了康巴地区民族分布众多、民族构成复杂多元的局面。目前，康巴地区的主体民族虽为藏族，但同时也有汉、彝、蒙古、纳西、羌、回等多个民族，他们均形成了与康巴藏族相互比邻或混居的局面。而单就康巴藏族的形成来看，其成分也是相当多元与复杂的。从总体上说，康区的藏族总体上以汉代以来当地原有的氏、羌、夷等众多民族成分为主体，吐蕃向康区扩张以来，在不断受到吐蕃和藏文化的融合与同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康区藏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演变过程：其一，吐蕃时期，吐蕃王朝对康区诸羌各部进行了长达二百余年的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使他们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其二，吐蕃王朝以

① 参见石硕《“藏彝走廊”：一个独具价值的民族区域——谈费孝通先生提出的“藏彝走廊”概念与区域》，《藏学学刊》2005年第2辑。

② 参见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

后，大量吐蕃部落及奴部流散于康区一带，遂与当地原为吐蕃属部的诸羌居民杂处，彼此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发展的道路。其三，公元10世纪以后，随着藏传佛教后弘期兴起，藏传佛教不断由卫藏地区向康区传播和渗透，从而使康区居民与卫藏地区居民在文化心理素质和语言文字上逐渐趋于一致。^①12世纪以来，由于民族间的迁徙、冲突与交融，陆续有若干民族成分以各种方式融合到康区藏族之中，这些民族成分包括了汉、彝、回、蒙古、纳西、羌等。正因为康巴藏族在族源构成上的复杂、多元特点，今天在康巴地区藏族内部仍存在众多支系，这些支系不少仍使用自己的母语。如在康巴地区有讲木雅语的木雅藏人；有讲道孚（尔龚）语的藏族人，自称“布巴”；有讲扎巴语的藏族人，自称“扎巴”；有讲贵琼语的藏族人，自称“贵琼”；有讲却域语的藏族人，自称“却域”；等等。这些不同支系的藏族人，彼此在文化和风俗上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种在同一民族内部存在众多人群及语言支系的情况极具典型意义，是民族走廊地区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有极高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价值。

三 康区是藏、汉民族交流互动及 西藏与内地之间的连接通道

康区西接卫藏，东面与川西平原的汉地相接，地域上介于西藏与内地之间，所以康区在东西方向上是藏、汉民族之间的过渡带与连接带，是藏、汉民族接触、交流、互动的通道，也是汉、藏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的地区。正因为如此，有学者从汉、藏联系角度也将康区称为“汉藏走廊”。^②

自公元7世纪吐蕃向东扩张以来，康区就成为吐蕃与唐朝相互交锋、不断拉锯的前线，并成为青藏高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最重要的交汇与连接地带。以吐蕃向东扩张征服和统治康区的众多部落为起点，康区众部落与民族开启了一个全面和长期的“吐蕃化”与“藏化”过程。此过程在7~9世纪主要表现为吐蕃的势力（包括吐蕃本部军队及移民）大规模进入康区

① 参见石硕《试论康区藏族的形成及其特点》，《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2期。

② 任新建：《康巴文化的特点与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脉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第95页。

及其对康区各部落及民族进行长达两百余年的征服和统治；在吐蕃王朝崩溃以后，则主要表现为公元10世纪后期一直到明清时期藏传佛教向康区的广泛与大规模传播。这两个过程使“康”这一区域最终完成“藏化”过程，成为藏族三大方言区和三大历史地理区划之一。

自宋代以来，汉、藏之间发生的大规模茶马互市亦主要经过康区，并在康区形成了著名的“茶马古道”。明清以来，康区进一步成为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一个重要连接枢纽和通道，驻藏大臣入藏也多取道康区。明清以来，康区日渐成为西藏与内地之间政治交往、汉藏贸易和汉藏文化交流的通道与桥梁地带，成为历代中央政权经营西藏的前哨和依托之地。在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西藏面临空前危局之际，清政府首先提出了“固川保藏”和“治藏必先安康”的思路，率先在康区（时称“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和社会变革。民国时期，康区先后发生的三次康藏纠纷以及西康建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也使康区成为左右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治走向及汉、藏民族关系的关键区域。

康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藏、汉民族的互动与交融。尽管秦汉以来已有汉人进入岷江上游、大渡河中下游和雅砻江下游一带，^①但明代以前，汉人在康区的活动主要限于大渡河以东地区。但这种局面在明清时期开始发生改变。明中叶以后，从东向西穿越藏彝走廊的川藏路开始成为联结中央与西藏地方的重要交通要道。^②1720年、1727年清朝两度经四川向西藏进兵，使川藏线的地位和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为了保障川藏线畅通，清康熙时期开始在川藏线沿途及重要隘口设置塘汛和粮台，并派四川绿营兵进行驻守。这带来了两个重要结果：一，驻扎于川藏沿线的汉人官兵逐渐开店经商、垦荒耕种，并与当地藏民通婚，相当一部分开始向移民转化；^③二，随着汉人官兵驻防带来安全保障，内地的汉商、官员及其随从、夫役、船工、内地流民、矿工、土司雇募的汉人文书与通事等纷至沓来，

① 沈仲常、李复华：《石棺葬文化中所见的汉文化因素初探》，《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

② 明英宗和明宪宗时，朝廷曾屡屡下令，要求乌斯藏往来内地使臣须取道四川，不得经河州。此后汉藏使臣往返也主要取道四川，以四川为正驿。参见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中国藏学》1992年第2期。

③ 时人称：“大凡康藏大道沿线汉民，十分之九，皆军台丁吏之遗裔”。见伍非百编《清代对大小金川及西康青海用兵纪要》，1935年铅印本，第163页。

汉人开始呈点线状分布于川藏线沿途，其中尤以汉商居多。从乾隆到嘉庆时期，受四川省人口膨胀与土地压力增大的影响，也有相当大数量的汉人进入康区垦殖与开矿。^① 故清代以绿营驻军入驻川藏沿线为先导，掀起了汉人向藏彝走廊地区大规模移民的浪潮。

清末民国时期汉人进入藏彝走廊的规模进一步扩大。1904年英军入侵拉萨，为应对严峻的边疆危机，清朝加强川边经营，派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大力推行办学、屯垦、练兵、开矿与通商等新政措施，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内地汉人前往垦殖，导致大量汉人迁入。据载当时“移民开垦，裹粮出关者以万计”。^② 进入民国时期，从1912年尹昌衡率军五千西征，到1930年“大白事件”及之后刘文辉24军进驻康区，由于川藏纠纷和局部战事不断，陆续调戍的汉人军队普遍分布于康定、巴塘、理塘、甘孜、昌都等各主要城镇，他们中许多人后来均在当地落籍。据统计，仅民国之初的十年间，进入川西藏区的汉人就达七八万之多。^③ 其后，抗战爆发、西康建省和汉藏商贸复苏等因素，再次推动了汉人向康区的迁移。此时进入的汉人身份类型也更趋多元，包括采药夫、各类工匠、政府官员及杂役人员、背夫、无业流民、各类考察人员等，其中又以垦民、矿工与商贾为主。周太玄《西康通志》载：“康定人口自抗战以来已年有增加。据最近调查，实已超过二万。其中汉人约占十分之六七。”^④

需要指出，清代、民国时期大量迁入康区的汉人，在当地并未或者说主要未作为独立民族存在，而是迅速同藏族发生密切交融。交融的主要途径是通婚。由于清代、民国时期进入康区的汉人主要为官兵、商人、垦民和各类工匠，均为单身男性，加之边地遥远，环境艰苦，汉藏通婚往往成为迁入汉人的普遍选择。《西康之种族》对当时康地汉藏通婚情形有如下描述：

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立业，娶夷为妻者，尤指不胜计，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种人（指汉藏通婚所生后代，当地藏语称“扯

① 刘正刚、唐伟华：《清代移民与川西藏区开发》，《西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黄树滋：《梦轩遗稿》，《开发西北》1934年第2卷第6期。

③ 陈重为：《西康问题》，中华书局，1930，第90页。

④ 周太玄：《西康通志稿·工商志》，四川省档案馆藏，第37页。

格娃”，即“半藏半汉”之谓），已遍布于城市村镇各地，真正夷族，则须深山内地，始能寻觅矣。盖清末之数万边军，及各地垦民，无不西康娶妻生子，川陕各地商民，在村镇经营商业者，亦多娶夷女辅助。^①

足见汉藏通婚的广泛程度。^② 汉藏通婚不但使大批汉人落籍于当地，而且带来汉、藏民族的深刻交融。由于当地为高原，迁入汉人不得不选择藏族的生活方式以适应环境，加之汉藏通婚，汉藏通婚家庭中的汉人在两三代以后，无论其本人还是后裔的生活方式均逐渐藏化，几与当地藏族无别。所以，清代、民国时期大量汉人迁入藏彝走廊北部所带来的汉、藏互动，其结果主要表现为“汉”向“藏”的融入。民国时期长期驻防理塘的曾言枢曾有这样的阐释：“汉人每每存意同化康人，入康久居，娶妻生子，亦自不觉间，装、靴、带、剑、语言、皮肤，俱康化矣。入其环境，有其环境之需要，所以理想不胜事实，固有其必然性在。”^③ 不过，这种融合实际上是双向的，一方面，因为汉藏通婚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落籍当地的汉人几代之后大多融入藏族；另一方面，这些汉人又把汉文化因素带入当地，形成当地人所说的“倒藏不汉”“汉人不纯，藏人不藏”^④ 的文化状态。对这种状态，格勒先生曾做过如下生动描述：

在康定、巴塘一带，一个家庭就享受着汉藏两种文化交汇的日常生活，他们既过藏历春节，也过汉族的中秋节，既讲汉语，又讲藏语，即供佛像，又贴对联，即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装，又穿汉装、西装，即相信山神、信仰来世，又相信市场、信仰金钱，

① 佚名：《西康之种族》，《四川月报》第9卷第4期，1936年，文中“西康”指西康建省后之康属范围。

② 1938年粗略调查显示，康定“除少数来自内地者，本地所谓汉人，十九皆汉夫康妇之混血儿”。见柯象峰《西康纪行》，《边政公论》第1卷第3、4期合刊。1941年，据调查，1938年前后的道孚县城汉藏混血儿约占2/3。见赵留芳《道孚县浅影》，《康导月刊》1938年创刊号。

③ 曾言枢：《宣抚康南日记》，《康导月刊》1943年第6期。

④ 伍呷：《九龙藏族社会的历史考察》，李绍明、刘俊波编《尔苏藏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第268页。

即崇拜大慈大悲的佛教精神，又崇尚能文能武的英雄精神。^①

清代、民国时期，汉人大量迁入康区所造成的大规模汉、藏互动与文化交融，不但提升了当地藏族在藏、汉文化之间的兼容性与中间性，增添了康区作为“汉藏边界”在汉、藏之间的纽带作用，而且使康区在东西方向上进一步成为“汉藏民族走廊”。^②

四 康区是一条历史文化沉积带， 沉积着众多历史遗留物

作为青藏高原东缘的高山峡谷地区，康区就如同一个密集地球皱褶地带，这个皱褶地带至今积淀和保留着许多古老而独特的社会形态、文化现象与文化遗存。比如，据文献记载，康巴地区东汉时已有“贵妇人，党母族”的部落，隋唐时代出现了著名的“东女国”。^③令人惊讶的是，一千多年过去，至今在康巴地区仍较完整地保留着女性中心的社会形态。川、滇交界的泸沽湖沿岸的摩梭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雅江两县交接处鲜水河流域的扎巴人，仍完整地延续着以母系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和“走婚”形态。与母系中心社会相对应，康区也保留了不少父系氏族的社会组织形态。例如，金沙江河谷深处的三岩地方保存着一种被称为“戈巴”和“巴错”的父系社会组织；康北牧区还完整地保留着一种以“骨系”（父系血缘）为纽带的游牧单位和血缘组织。同时，康巴地区至今还存留着相当数量独立和尚待认识的语言，即费孝通先生所称的“被某一通用语言所淹没而并没有完全消亡的基层语言”。^④这些语言在当地被称为“地脚话”，其使用人数多则上万，少则几千和几百，他们与外界交流时多使用藏语、彝语或汉语，回家则说“地脚话”，这些有着“活化石”之称的“地脚话”引

① 格勒：《略论康巴人与康巴文化的特点》，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第7页。

② 任新建：《康巴文化的特点与形成的历史地理背景》，泽波、格勒主编《横断山脉民族文化走廊——康巴文化名人论坛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第95页。

③ 见《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隋书·女国传》《旧唐书·东女国传》。另参见石硕《〈旧唐书·东女国传〉所记川西高原女国的史料纂乱及相关问题》，《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

④ 费孝通：《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

起了语言学者的广泛关注与极大兴趣。^① 康巴地区迄今还保留着大量独特的古代石碉,即《后汉书》记载的“邛笼”,^② 在今大渡河上游的丹巴县境内,古碉数量之密集着实令人惊叹,号为“千碉之国”。这些石碉今天虽已丧失实际功用,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历史遗产,其文化价值与丰富的社会内涵正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今天,康巴地区保留下来的宗教种类及各种原始宗教形态也极为丰富和复杂多样。康区集中了现今藏传佛教的所有教派,甚至连近乎消失的一些教派如觉囊派等,以及佛教传入以前存在于藏区的最古老本教,也均在康区有较好的保留,金川一带还流行“入寺信黄教,在家信本教”之俗。即便是在藏传佛教覆盖地区,在民间的社会生活层面也仍大量保留着可称为“底层”的各种原始宗教成分,康区不少地方至今仍普遍存在着一些不属于任何寺庙而被人们称为“工巴”“达巴”的民间巫师。一些地区还保留着用象形文字写成的经书等。所以,古老原始文化的大量存留可以说是康区一个异常突出的特点。康区可以说是目前我国民族文化的原生形态保留最完好、历史积淀最丰富,同时疑难问题最多的地区,有极高的考古、民族、历史、语言等学科的研究价值。

五 康区地域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复合性与兼容性

多样化的自然环境,地处农牧混合与农牧过渡带和民族走廊地带的多民族交融与互动,作为西藏与历代中央政权连接通道带来的藏、汉民族互动,以及由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形环境造成的历史文化沉积,给康区地域文化带来了一个显著特点——康区地域文化具有突出的多样性、复合性与兼容性,这使之成为藏族三大传统区域中极富特色的一个人文地理单元。就多样性而言,青藏高原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种地域文化能够与康区相媲美。在藏族三大传统区划(三大方言区)中,康区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形态、社会类型等各个方面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都堪称首屈一指。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均可用“异彩纷呈”来形容。康区

① 参见黄布凡《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

②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第2858页。